



評論
t

以北都發展推動大灣區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



議事廳
何建宗

特區政府公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將北部都會區定位為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引擎，以及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主平台。行政長官在2026年施政報告進一步提出以「一城五元素」（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城市建設）的布局理念，規劃建設新田、洪水橋、打鼓嶺三個大學城，推動創科與產業協同發展。然而，跨界合作的深層障礙，不在於空間地理的阻隔，而根植於不同法律體系、行政體制與監管標準所引發的制度磨合。

自大灣區建設啟動以來，廣東省分四批次相繼推出了70項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展示了灣區制度创新的豐富實踐與演進脈絡。系統梳理這些案例可以發現，大灣區的規則銜接已從早期的單點突破，逐步演進為多維度的制度創新形態。將這些成熟模式與策略系統運用於北都建設，打造高水平的跨界制度融合試驗場，是推動大灣區一體化走向縱深的關鍵所在。

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的三大模式

從廣東省公布的70項規則銜接機制對

接典型案例來看，大灣區的制度突破正循着三條路徑層層推進：

第一，單向適配。這種模式體現為內地或香港單方面向對方開放市場、資格或許可，以及公共服務規則的跨界延伸。在現實中，多數情況為內地主動對接香港規範、放寬准入門檻，以及將公共服務延伸至港澳居民。例如，在專業資格准入方面，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打破了法系壁壘，允許港澳律師在內地九市辦理部分內地法律事務；「港澳藥械通」經國務院授權，簡化內地既有審批流程，引進香港已上市的臨床急需藥械；「港車北上」與跨境社保「灣區社保通」則通過簡化流程與離岸辦理，實現了單向的政策開放與服務延伸。單向適配有效降低了特定領域的跨界門檻，是打破初期制度冰山最直接的路徑。

第二，雙向互適。雙向互適是基於既有規則體系，通過雙向協商、對等認可與相互調適，消除規則碰撞摩擦。當合作觸及金融、監管與複雜市場機制等深水區時，單純的單向開放已經不夠，需要兩地市場規則與監管框架進行「對等適配」或「互為吸收」。例如，「跨境理財通」建立在兩地既有金融監管框架之上，通過雙方監管授權與機制微調實現資金雙向流動；深圳在香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

既沿用了香港國際化資本市場的發行規則與定價體系，又獲得了香港金管局將相關債券納入既有抵押品框架的政策支持；在前海建設領域與河套數據跨境交易試點中，內地吸收借鑒了香港工程建造責任體系與數據合規框架，實現了兩地既有監管體系的雙向銜接與優化。

第三，共同創制。這是規則銜接的最高形態。與前述基於既有規則體系進行調適的「雙向互適」不同，共同創制不再局限於對既有規則的微修小補，而是超越各自原有的制度束縛，由兩地共同協商，創制出適用於大灣區的全新標準與一體化新流程。最典型的莫過於粵港澳三地共推「灣區標準」與「灣區認證」，通過共建專家委員會與認證聯盟，創制出覆蓋數十個領域的全新統一技術規範；在口岸通關領域，青茂口岸的「合作查驗、一次放行」以及客貨車「一鎖三地通」和「粵澳聯合一站式」查驗，均是以技術與流程創新重塑法律與行政邊界的全新創制。

將北部都會區打造成制度创新的戰略承載與主平台

從廣東省70個案例的實踐經驗來看，過往的規則銜接多屬於「單點突破」或「特區試點」（如前海、橫琴、南沙、河套）。而香港正在推進的北部都會區建設，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的再造，更是將這些零散

的規則銜接經驗進行系統整合為「完整制度生態」的絕佳主平台。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中明確的北都「一城五元素」的發展架構，無論是新田大學城定位的生命健康科技與人工智能，洪水橋大學城定位的智能製造與應用工程，還是打鼓嶺大學城預留的戰略發展空間，其核心要素——資金、數據、人才、設備與科研成果——無一不需要頻繁且高頻地跨越兩地邊界。如果北都僅停留在物理基建層面，而未能打通規則機制的「任督二脈」，其作為「新質生產力引擎」的功能將大打折扣。

未來北都在推進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時，可重點從以下三個維度實現跨越：

一是深化工程建設與基建標準的共同創制。北都擁有龐大的土木工程與基礎設施需求。應充分借鑒前海建設領域銜接與「灣區標準」的經驗，在北都大學城及創科園區的建設中，聯合內地共同制定建築材料合規與綠色建築的「灣區新標準」。通過採信香港及國際通行的建造管理體系，結合內地高效的供應鏈能力，同時探索在北都等重點區域放寬勞工政策，增加勞動力供應，多管齊下降低跨界建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是突破科研要素與數據治理的雙向互適。針對新田與洪水橋大學城的創科定位，必須打通「資金過境」與「數據過

境」的卡點。在總結廣東省財政科研資金跨境撥付試點及河套數據跨境交易經驗的基礎上，依託北都創科園區，建立安全可控的「數據特區」與跨境驗證機制。在保障國家數據安全底線的前提下，基於兩地既有數據安全法規進行雙向調適，實現生命健康與人工智能科研數據的安全合規流動。

三是推進人才體系與公共服務的全面適配。北都的發展關鍵在人才。應將「灣區社保通」、粵港政務服務「跨境通辦」以及境外人才「考、評、認」全鏈條機制深度植入北都的社區與園區建設中。通過「小切口」立法或特定區域授權，進一步拓寬港澳及國際專業人才（如醫療、建築、科研、工程等）在北都的便捷執業範圍，真正實現「規劃主導、產業帶動、以人為本」的宜居宜業宜遊的創科大都會。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進入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攻堅期。在首個五年規劃的引領下，北部都會區不僅是香港經濟轉型的新引擎，更應成為大灣區規則機制全面對接的「試驗場」與「示範區」。唯有有敢為人先的魄力打破制度藩籬，方能將兩制之利發揮至極致，引領大灣區高質量發展邁上新台階。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北京市政協委員

海外法官加盟 彰顯香港法治堅如磐石



有話要說
江樂士

10月16日，行政長官接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建議，任命區諾德爵士（Sir Terence Arnold）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對此表示歡迎。

特區諾德爵士正式獲委任後，終審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將增至6人，法官總人數（包括首席法官）則達14人。司法機構表示，「這將提高處理終審法院工作的靈活性」。區諾德爵士曾任新西蘭最高法院常任法官及前副總檢察長，司法經驗深厚，他的加盟必將廣受法律界歡迎。

終審法院在審理上訴案件時，會由五名法官組成法官團。當中必定包括首席法官、三名常任法官，以及一名香港非常任法官或一名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自1997年以來，多位海外法官帶來了廣闊的國際視野，令本地法官獲益良多。

在現任海外非常任法官中，資歷最深的兩位是來自英國的賀輔明勳爵和廖柏嘉勳爵。他們早在2020年6月香港國安法實施前便已獲任命。儘管他們與其他海外法官一樣，因香港國安法而遭到英國反華勢力施壓，逼迫他們辭任終院職務，但兩人斷然拒絕。他們堅守就職誓言，對香港特區保持忠誠，香港各界理應對他們深表感激。

令人不齒的是，英國保守黨高層竟罔顧司法獨立，帶頭發難。他們顯然是妄圖藉由打擊終審法院，動搖「一國兩制」根基，進而削弱中國。譬如，

前保守黨前黨魁伊恩·史密斯於2020年9月聲稱要重新審視終院所有海外法官的任命，誣稱海外法官能在英國和澳洲大公無私地裁決，在香港卻做不到。

這番言論對香港極盡抹黑之能事，要知道，香港司法機構的專業程度在亞太區名列前茅。儘管如此，後來同樣當上保守黨黨魁的特拉斯早在2022年3月擔任外相期間，也散播類似謬論。她妄稱英國現任法官繼續留任終院已經「站不住腳」，更揚言此舉有「將打壓合法化」的風險。

儘管有兩名英籍非常任法官聽從特拉斯的煽動，辭去終審法院職務，但這番政治操弄令所有堅信法治的人感到震驚、憤慨。放眼整個普通法世界，向法官施加政治壓力向來為人所深惡痛絕。

英國這齣政治鬧劇至少證明了一點：香港特區的司法獨立受憲制保障，法治根基比英格蘭和威爾斯更為穩固，不會受外部影響，終審法院不僅穩如泰山，發展更勝從前。終院持續攬攬到頂尖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司法水平依然傲視同儕。

事實上，最新加入的海外非常任法官輕易識破了西方針對特區國安立法的種種抹黑與謊言。他們清楚知道，香港的國安法律不僅充分保障人權，更與他們母國的同類法律高度一致。他們深刻理解終審法院的職責在於公平詮釋法律、彰顯公義——這正是他們欣然接受任命的原因。

2023年，澳洲高等法院前法官及澳洲聯邦法院前首席大法官祈顯義出

任終院海外非常任法官，成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首位獲委任的海外法官。2024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前新南威爾斯州上訴法庭庭長、前澳洲聯邦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歐頌律亦加入終院。到了2025年，前新西蘭上訴法院院長及前新西蘭最高法院常任法官楊偉廉爵士成為最新一任海外非常任法官。**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英國政客企圖破壞終院；而這些重量級法官的加入，正是最有力的反擊。**

特區諾德爵士履新後，來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非常任法官陣容，將包括兩名澳洲法官、兩名新西蘭法官及兩名英國法官。香港特區正不斷鞏固法律實力、拓展國際影響力，這批具備全球視野的法學泰斗，正是特區當下亟需的頂尖人才。

此外，隨着英國工黨政府於2024年上台，中英關係有所回暖，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未來會有更多傑出的英國法官像賀輔明勳爵和廖柏嘉勳爵那樣，加入海外非常任法官的行列。鑒於英國與香港深厚的歷史淵源，必定有許多像祁彥輝爵士一樣的退休法官，欣然把握機會在特區延續司法事業，這亦是理所當然之事。

與本地法官一樣，海外非常任法官立場堅定，絕對能夠無懼無偏地秉行公義，也絕不容許自己被反華分子所威嚇。香港特區的法治前景必將更加光明。

註：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



議事廳
陳克勤

香港無障礙設施的防滑問題，值得各界關注。觸覺磚本是為協助視障人士獨立出行的無障礙設施，但由於香港天氣多雨、路面濕滑，摩擦系數較低的觸覺磚導致路人跌倒的事件屢見不鮮，這不單單不便於長者、輪椅者出行，更對視障人士的出行帶來較大安全隱患。

該問題存在已久，在香港社區也曾一度引發關注。例如葵青區在2024至2025年間，便接獲11宗在觸覺磚上滑倒受傷的報告；大埔區、灣仔區、中西區亦都曾接獲居民的滑倒投訴。建議相關部門引入措施，持續改善物料防滑性能，並對高風險區域增加語音提示，設置系統檢查更換時間表，保障觸覺磚的長期安全和有效使用，維護道路及行人安全。筆者就此提出三個建議：

第一，加強觸覺磚防滑性能定期檢查，持續改善道路情況

建議將防滑性能納入檢測標準，按照路段風險擬定定期檢修頻次，優先覆蓋斜路、轉彎位、露天及長者、學童密集路段。香港目前針對觸覺磚的改善措施主要依靠零散投訴和被動巡查發現問題，往往是在市民跌倒受傷之後的補救，而不是在事前的預防。相關部門目前已有針對路面安全的定期巡查機制，其中行人路每個月會進行一次安全巡行，但主要針對路面破損情況，而非防滑情況。參考其他多雨地區，比如英國就將防滑值納入定期檢測的範圍，高風險位置每半年至一年檢測一次，並在水浸後進行測試；新加坡則由主管部門按照統一標準，根據風險系統性地換露天高人流路段的觸覺磚，並協調維護，香港亦可參考有關做法，根據成本情況選擇合適的改善措施。

第二，短期應急與長期更換並行，按損耗程度分級處理物料

短期來看，可以增設防滑塗層。去年4月，

有立法會議員聯同地區關注組委託實驗室抽檢葵青區公共屋邨的觸覺磚，發現防滑值遠低於房屋署要求。相關部門亦都十分重視，現階段已在葵青區70個位置完成各類觸覺磚優化工作，為觸覺磚增設塗層，並設置警示牌等。考慮到施工時間及成本因素，從短期來看，對於磚塊未破損嚴重、僅防滑受影響的位置是可行的。但塗層防滑能力會隨使用下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長期來看，建議在採購階段選擇防滑介質嵌入材料內部的產品。比如倫敦地鐵，其採用的防滑磚不是依靠防滑塗層，而是將堅硬的碳化矽顆粒嵌入防滑磚內部，並均勻分布在材料中，這樣即使受到表層磨損，內部亦有防滑顆粒，性能足以維持25年。在澳洲、日本則部分採用陶瓷介質，亦可長期穩定防滑，建議香港在更換時考慮產品的使用壽命與防滑時間。

第三，增設語音提示，保障視障人士行路安全

建議結合定期檢查結果，在防滑標準暫未達標或經常性磨損的路段，除了盡快更換物料或施加塗層外，亦增設計對性語音提示。現階段，在部分濕滑路面的處理中，相關部門會增設警示牌以降低意外風險，這難以對視障人士起到有效警示作用。香港路面濕滑，觸覺磚作為視障人士的導航設施，應切身考慮其需求。香港目前在交通燈處已安裝發聲裝置，亦可考慮在防滑標準暫未達標或經常性磨損的路段添加類似的語音提示用以警示，重新鋪設時亦可增設觸覺警告磚作為必要的補充。

道路安全無小事。觸覺磚不單單是視障人士的導航磚，亦都需要是市民出行的護航磚、符合標準的安全磚。建議政府對觸覺磚防滑度開展定期檢查，根據檢查結果增加塗層，並更換具備長期防滑效果的物料；亦都要在高風險路段增設語音提示，對視障人士起到警示作用，守護市民安全。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北都有潛力發展成另一個核心商業區



思政策
胡恩威

香港第一次制定落實覆蓋全局的五年規劃，在這份規劃的背後，反映出特區政府一個清晰的戰略判斷：香港未來的空間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過去百餘年以中環為核心的發展模式，正被「南金融、北創科」的雙引擎設想所取代。而這個新引擎的心臟，正是北部都會區。

問題隨之而來：北都能否發展成香港的另一個核心商業區？

答案要先從人民幣說起。截至今年8月底，香港人民幣存款為11012億元，人民幣貸款規模已突破1萬億元，兩者已非常接近。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樞紐，已經從單純的「資金池」走向了「信貸與融資中心」。但隨之而來的瓶頸也顯而易見：資金來源的多元化和成本管理，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此，金管局助理總裁朱海斌早前說得很直白——隨着人民幣作為融資貨幣的規模快

速擴展，香港下一步需要拓闊離岸人民幣資金來源，完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和相關配套。

「金融+創科」雙引擎發展

換言之，人民幣國際化這盤棋走到今天，需要一個更大的棋盤。現在的中環已經夠擁擠了，它的土地資源、空間容量和產業密度，都不足以承載一個面向大灣區、面向國際的離岸人民幣生態系統的全面升級。北都則恰好提供了這個空間。

如果說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是北都足以成為「新中環」的「軟件」，那麼深圳的科技生態就是它的「硬件」。

前海目前集聚了5.5萬家科技企業，現代服務業企業超過12萬家，人工智能集聚區擁有455家相關企業，營收超過3000億元。深圳科技園方圓數公里之內，坐落着百餘家上市公司，其中有二十多家在港交所上市，分布着2000餘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不少是港資企業。

這種密度和規模，放在全球任何一個

城市群裏都是頂尖的。但長期以來，深圳的科技企業和香港的金融機構之間，隔着一條深圳河，也隔着一套尚未完全打通的人才、資金和數據流動機制。

北部都會區建設，從一開始就帶有打破這種隔閡的使命。施政報告將北部都會區的章節置於經濟布局的顯著位置，核心思路是「金融+創科」雙引擎發展——金融為創科提供資金與發展條件，創科則為金融帶來新場景與新需求。在制度層面，政府強調「拆牆鬆綁」，為北都建設建立更簡易靈活的行政框架，包括快速審批制度、多元和分階段開發模式、靈活批發土地、按實際興建樓面及實際用途釐定應繳補地價金額等措施。這些制度创新的指向很明確，讓金融機構和科技企業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落戶北都。

但要成為核心商業區，光有金融和創科還不夠。中環之所以是中環，不僅僅因為有銀行和律所，更因為它有一個完整的都會生態——法院、仲裁機構、政府部門、專業服務、住宅、學校，所有這些元素共

同構成了「中環格局」。北都要成為另一個核心商業區，同樣需要這套完整的制度基礎設施。甚至從更宏觀的角度而言，未來香港也應該成為「大灣區的中環」，以金融業帶動大灣區經濟全面發展，進一步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打造成「大灣區的中環」

說到底，「新中環」是一個涉及整體都會格局的概念。規劃署預計北都將建設50萬個住宅單位，創造50萬個就業機會，以「15分鐘生活圈」理念規劃社區，市民步行或踩單車不超過15分鐘便可解決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這意味着北都不僅是一個產業園區，亦要有完整的城市功能。當金融機構、科技企業、仲裁機構、政府部門和住宅社區在同一個片區內形成有機互動，北都才真正具備了「都會」的格局。

當然，社會上有人擔心北都的住宅供應過剩，也有人認為距離北都完全發展成熟至少還需要十年時間。這些擔憂並非沒

有道理。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環也是經過百餘年的發展才成為今天的模樣。但關鍵在於，方向是否正確。

五年規劃已經給出了方向。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意味着這已經從區域規劃上升為國家戰略。深圳的科技發展已是世界級水平，大灣區的製造業和機械人產業正在形成完整的生態系統，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也在加速。這些外部條件已經成熟，香港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定位和一個果斷的執行。

北都，不必是中環的複製品。它應該是一個升級版的「中環」——以人民幣離岸業務為金融核心，以深港協同為創科引擎，以國際仲裁和專業服務為制度支撐，以產城融合為空間形態。這個「新中環」，面向的是大灣區，對接的是國際，承載的是「一國兩制」在新時代的創造性實踐。

深圳河對岸的燈火已經亮起來了。北都，也是時候回應了。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